

21世纪

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透视

尚重生 编著

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成为夫妻，两个人的世界  
就开拓出现实又虚掩，矛  
盾、冲突甚至战争等现象。

要认定我国社会当前贫富差距的状况，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方法论  
层面来看，它既有事实判断，又有  
价值判断，还有复杂的心理认知过程。

同历史上任何一个剧烈变化的  
时代一样，这是一个充满问题的  
社会，老问题还没有解决，新  
问题就开始生发并接踵而来。  
一些问题的解决之有效手段，  
一些问题的解决手段本身就是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城市果真能够抛开  
农村，独自繁华和秀丽吗？显然  
不能！如果农村是贫穷、愚昧和落后的  
城市的富裕、文明和先进，就显得没有  
基础，很虚假，就像海市蜃楼一样。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21 世纪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http://www.wdp.com.cn>

当代中国

#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透视

● 尚重生 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透视/尚重生编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6

21 世纪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ISBN 978-7-307-05503-2

I. 当… I. 尚… III. 社会问题—研究—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2918 号

责任编辑:严红柴艺 责任校对:程小宜 版式设计:支笛

---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凯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75 字数:270千字

版次: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5503-2/D·723 定价:15.00元

---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  
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编审委员会

---

主任委员：顾海良  
刘经南

---

委员：陶德麟  
韩德培  
马克昌  
谭崇台  
刘纲纪  
朱 雷  
冯天瑜  
彭斐章  
郭齐勇  
陆耀东  
杨弘远  
查全性  
宁津生

21世纪

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 内 容 提 要

了解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不仅是把握我国国情的一种有效方式，而且是知晓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分化、社会结构变革以及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较为直接的途径。本书在对社会问题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依次探讨当代中国社会九大热点问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下岗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人口生态问题、社会犯罪问题、教育危机问题、道德失范问题和婚姻家庭问题。透视这些社会问题所遵循的总体思维逻辑是：在现象描述中对社会问题进行事实认定和成因探寻，与此同时，还要在分析问题后果的基础上，指出解决问题的一般性对策选择。本教材不但适用于对各类大学本科和专科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对所有关注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读者，都可提供极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和思考方法。

总序

顾海良

进入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形成的共识之一，就是要着力教育创新。教育创新共识的形成，是以对时代发展的新特点的理解为基础的，以对当今世界和我国教育发展的新趋势的分析为背景的，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任务为目标的，深刻地反映了高等教育确立“以人为本”新理念的必然要求。教育创新的首要之义就在于，教育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要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各类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相适应，努力造就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

发展的人才。为了达到教育创新的这些要求，高等教育不仅要实行教育理论和理念的创新，而且还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特别要注重学科与专业设置的调整和完善，形成有利于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和提高国民经济水平发展的学科专业和教学内容；要注重人才培养结构的优化，形成既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级各类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又能体现和反映高校优秀的办学特色、办学风格和办学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教学创新的这些措施，必然提出怎样对传统意义上的以“学科”、“专业”为主体的教育教学结构进行整合，并使之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通识”教育相兼容和相结合的重大问题。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中的“专”、“通”关系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至于与“专业”教育相对应的“通识”教育的思想，出现得更早些。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与“自由”教育相联系的“通识”教育的思想。这里所讲的“通识”教育，通常是指对学生普遍进行的共通的文化教育，使学生具有一定广度的知识和技能，使学生的人格与学识、理智与情感、身体与心理等各方面得到自由、和谐和全面的发展。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曾经经历过时以“通识”教育为主、时以“专业”教育为主，或者两者并举、并立的发展时期。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来看，早期的高等教育似倚重于“通识”教育。随着经济、科技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也相应地细分为不同学科、专业，分别培养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专业”教育的比重不断增大。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技的飞速进步、知识的不断交叉融合，使学科之间更新频率加快，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并存，“专才”与“通识”的需求同在。但是在总体上，“通识”似更多地受到重视。这是因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培养的

人才，应该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应该具有更为宽厚的知识基础和相当广博的知识层面，应该具有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多方面的交流能力。显然，仅仅依靠知识领域过窄的专业教育，是难以培养出这样的人才的。

我国大学本科教育专业一度划分过细，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素质教育薄弱，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多有不足。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和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类型和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对人才的规格和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划分过细的专业教育易于造成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短缺。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我国加入 WTO，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继续走划分过窄、过细的专业教育之路，就可能出现一方面人才短缺、另一方面就业困难的严峻局面，将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将使我国高等教育陷于困境。我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深切地认识到这种严峻的形势。教育部前几年就在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推出了经大幅度修订的新的本科专业目录，使本科专业种类调整得更为宽泛些。各高等学校也在进一步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研究和修订教学计划，改革教学内容，努力使专业壁垒渐趋弱化，基础知识教育得到强化。这些都将是利于学生拓宽知识面，涉猎不同学科和专业领域，增强适应能力，全面提高综合素质。

在高等教育“通”、“专”关系的处理上，教育创新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通过教育创新，一方面能构筑高水平的通识教育的平台，另一方面也能增强专业教育的适应性，目的就是做好“因材施教”，实现“学以致用”。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要解决好选人制度即招生制度创新和教师队伍建设和创新外，还要注重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方法，以及教材建设等方面的创新。武汉大学有着坚持教育教学改革的优良传



统，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方法改革、教材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努力。学校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经费加强名师、名课、名教材建设，其中通识教育指导选修课程建设得到全国许多高校教师的积极支持和高度赞赏。

近些年来，我们经过精心组织与策划，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套通识教育系列教材，力图向大学生展示不同学科领域的普遍知识及新成果、新趋势或新信息，为大学生提供感受和理解不同学术领域和文化层面的基本知识、思想精髓、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为大学生日后的长远学习提供广阔的视野。我们殷切地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通识教材面世，不仅要授学生以知识、强学生之能力，更要树学生之崇高理想、育学生之创新精神、立学生以民族振兴志向！

(作者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 前 言

时光如流水，转眼间，我国现代化的列车在改革开放的轨道上已前行二十多年。回首往事，察看现实，审视未来，应该说，每一个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人，当他们得到越来越多的财富和幸福、拥有越来越多的欲望和追求时，都不能不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曾几何时，在那闭关锁国的年代，我们关起门来充“老大”，结果是现代化离我们越来越远；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们一心一意闹“革命”，结果是打内仗、窝里斗、人人自危，抓“革命”并不能促生产；在那计划经济和物质短缺的年代，我们不得不为生计而苦苦奔波，吃饱穿暖成为一个很高的理想。但是现在，我们有幸告别了往日的幼稚与狂妄、麻木与僵化，一步一步回到理性与常识。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几千年来，曾经贫弱的祖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生机与活力；我们曾经苍白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自尊、有底气、有豪情！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欢笑和歌唱，颂扬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一个积聚了巨大能量和突飞猛进的中国、一个新事物层出不穷的中国。面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所取得的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有理由把现世认定为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岁月。面对太平盛世和盛世太平的似锦繁华，谁能阻止我们发出由衷的欢歌笑语！

然而，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变化剧烈的历史时期，人们习惯于把这个时期称为“转型期”，即从以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

化；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从同质单一性的一元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的多元社会转化；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从相对封闭的社会向越来越开放的社会转化。事实上，这样的社会转型，是具有双向同构性、改造社会与改造人的浩大工程；是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不断裂变的过程；社会转型，就其内容和形式来看，它是和平岁月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社会革命；就其实质而言，它是社会利益格局的解构和重构过程。

同历史上任何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一样，这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社会，老问题还没有解决，新问题就开始生发并接踵而来。一些问题缺乏解决的有效手段；一些问题的解决手段本身就是问题；一些久拖不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化；一些病入膏肓的严重问题甚至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一些人已经或正在丧失问题意识，对存在的问题要么不自觉地麻木和冷漠，要么自觉地保持沉默。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社会问题，也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漠视社会问题存在的理由。在问题观上，任何麻木和自我陶醉都不能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一笔勾销；任何轻视和懈怠的态度，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有可能使一些问题蔓延开来，愈演愈烈。

当代中国社会，从社会问题的视角，我们不难看到：权力腐败没有得到根本遏制；贫富差距开始悬殊；下岗失业者困难重重；农民负担一时难减；团伙犯罪日益猖獗；信仰缺失、道德失范；婚姻家庭问题增多；环境污染趋于恶化；应试教育成为顽症……这些严重而又紧迫的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或解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社会稳定、民族复兴等大业都可能被毁掉。这是我们唱罢盛世欢歌之后应该听到的盛世危言。

居安尚需思危！盛世不能没有欢歌，盛世更不能没有危言！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并且热衷于欢声笑语、歌舞升平，很容易忘记或者不愿意直面客观存在着的问题以及存在问题的

严重性，甚至有时把善良的逆耳良言当做异己的不和谐音加以打压。另一方面，社会问题也很容易被掩盖和遮蔽。一般来说，在没有内外监督压力的条件下，在上下级垂直的隶属关系中，下级很不愿意向上级报忧患，与此同时，上级也非常喜欢听喜讯。还有，在现实生活中，一般来看，我们宣传和渲染成绩的力度很大，而暴露和揭示问题的决心很小，这样的思维定势和惯常态度，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有时还增加了解决一些问题的难度。因为如果对存在的问题都不能或不敢正视和直面，那我们还怎么谈得上解决问题呢？

有人认为，研究社会问题容易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任何社会都有社会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有一些社会问题，正常得很，不必大惊小怪甚至杞人忧天。中国有腐败，美国那么发达和强大，还不是有腐败吗？克林顿不也搞婚外恋吗？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有大而化之，以宏观取代微观、以抽象消解具体之嫌疑。任何不承担责任的人，满脑子的革命话语但完全没有忧患意识的人，都可以总是这样讲，因为这样的话语似乎永远是对的，哪怕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到消解甚至瓦解我国政权合法性的地步！再说，中国有腐败，美国也有腐败，中国和美国就打成平手了吗？不看具体问题，各打五十大板，这是一些人特有的“扯平”心态。

有人认为，研究社会问题是专挑毛病、专攻社会阴暗面，不看阳光灿烂，只拿问题说事儿。它是制造噪音，非常不利于唱响“主旋律”。因为成绩和问题的区别，总是主流和支流、主干和枝叶、整体和部分的区别，是“七三开”或“八二开”。有点儿问题，是社会常态，没什么大不了的。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斗争哲学和霸权话语。一个良性运作的正常社会，如果问题、毛病和阴暗面是客观存在的，就应该得到披露和理性追问。此外，如果失去了对于社会问题的知识理性和常识理性，想唱响主旋律是很困难的。

也有人认为，在信息传媒时代，无论客观事实如何，对于统治或治理来说，社会问题不能暴露多了。因为把问题暴露多了，危言说多了，悲观的社会情绪就会弥散，因而就会导致“灭自己志气，长敌人威风”的被动局面，其实，就这句话本身来说，它不仅是没有志气的表现，而且是唯心的英雄史观论，因为它的潜台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外，如果“敌人”的威风那么容易长，我们的志气那么容易灭，这肯定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威风 and 真志气。

如果说我们正生活在盛世，那么为盛世立危言，意义尤为重大。因为盛世有了危言，在成绩和成就面前，我们才会有一份理智和清醒，以免自吹自擂、以自我为中心，以免专横跋扈、骄奢淫逸。我们才有可能敢于面对不得不面对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因为盛世有了危言，我们才能对自身进行正确的定位，不断明确强于自己的竞争对手的优势所在，以利于赶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只有这样，盛世才能持久。

对一个欠发展、追赶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很容易发现，当代中国之社会问题在总体上属于发展阶段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发展的成就令人欣慰，发展中的问题使人忧虑。就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而言，有些社会问题是我们在经济、政治发展过程中，社会变迁和制度变迁的特定历史阶段必定会遭遇的问题；有些是盲目发展本身所引发和产生的问题；有些根本就是欠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前，我们没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但那时我们缺少甚至没有发展，而没有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是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因此，不能丢掉发展观去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不能因为问题的存在而看不到发展，更不能以问题事实去否定发展的重要性。原来我们说，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我们讲，只有可持续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可持续发展的道理之所以硬，就是因为它可以从根本上不断地解决我

们所面临的许多十分棘手的社会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曾经经历过两千多年王朝循环式的封建专制社会，封建主义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这不可能不给当代中国之社会问题打上历史的印记。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罗荣渠先生在他的《现代化新论》一书中，对自秦帝国建立大一统格局后，两千多年来中国所形成的独特的历史连续性的原因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总结。

第一，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辽阔，但数千年来一直保持封闭式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这种经济不同于地中海型的农商结合的奴隶制经济，也不同于西欧型的农牧结合的大庄园制经济，而是一种农业与家庭副业相结合的分散的小农制，精耕细作，灌溉技术先进，农产率在前现代时期相当高，但仍是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第二，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世袭君主官僚制帝国，这既不同于罗马帝国式的寡头与僭主政治，也不同于西欧式封建贵族统治，而是由庞大的官僚进行卓有成效的文官统治。法律缺乏对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保障。第三，中国是一个家族本位、农村导向的半封闭性宗法社会。其特征是血缘家族本位，父家长制，众子均分继承制，祖先崇拜，重视传宗接代，个人价值受到贬抑。第四，中国是一个以儒教人文主义为中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大国，也还有其他文化成分。儒学的庞大思想体系中包含着许多实践理性，德治和人治思想、民本思想、变通思想、自强思想，但其核心是“忠”“孝”伦理价值观。<sup>①</sup>

这些因素可以成为我们把握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和文化背景。

---

<sup>①</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29~530页。

就具体的社会问题而言，无论是就其形成、演变的过程，还是就其解决的方式、方法，它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既具有国际性，又具有中国特色；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变动性。比如人口问题、农民问题，可谓由来已久；能源生态问题已是全人类的共同忧患；而腐败问题，尤其是集体腐败和弥散化的社会性腐败，又极具转型期的“中国特色”。

我们深知，情绪化或者极端情绪化的思维和话语，从来就无助于任何问题的实际解决，但是，我们还是对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极为忧虑，有时甚至是焦虑。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再也经不起一些问题的拖累，我们的人民再也经不起一些问题的折腾，我们国家再也不能丧失走向强盛的机遇。更为严重的是，现在许多人还缺少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问题意识”，特别是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他们已经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轨道上“驾轻就熟”，有的已经习惯于声色犬马的豪华生活，正在丧失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最起码的认知和感知能力。有些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引起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特别关注，本来应该得到遏制或解决的问题却蔓延开来、愈演愈烈。普通民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无能为力。

的确，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绩斐然，举世瞩目。中国社会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走上了由大国迈向强国的路径。然而，一些久久纠缠我们的社会问题如果解决得妥当和及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会进一步提高，我们发展的代价和成本会更低一些，内耗会减少，社会福利蛋糕会做得更大，政府对整个社会的调控能力会更强，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差距会进一步变小。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会更强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会更加富裕，因而政治凝聚力还会增加，执政党政权的合法性会不断加强，我国社会会更加安定团结，日趋和谐。这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素质和整个文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党和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的期望值愈来愈高，虽然，我们所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

已经或正在获得有效的解决，但是，在人们更高更急迫的期待和期望中，这样解决的质和量，显得远不够力度和有效率。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问题呢？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又叫社会的病态、反常和失调现象。国外社会学家关于它的界定主要有以下三种：

——社会问题即公众问题，它不是指社会生活中单个人所遇到的困扰，而是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Public Trouble）。

——社会问题是一种情况或情景，它长时间地引起许多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困苦、紧张乃至失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加以干涉的必要。

——社会问题是指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的存在，它们被大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一部分有影响力的精英人物，视为不理想、不可取，因而需要全社会给予关注，并设法加以改变的那些社会情况。

国内学者对社会问题的界定主要有以下五种。

——社会问题就是社会全体成员或相当多的人，他们的生活或进步遇到了障碍，社会有些失序，开始没有安全感，原本正常的生活或者应该正常的生活，越来越不顺利。

——社会问题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综合现象，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失调，社会的正常运行遭到破坏，社会难以协调发展。

——社会问题是指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异和矛盾。这些矛盾的生成虽然是局部的，但其演变及后果具有全局性，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导致不同社会群体日益复杂的利益摩擦和关系紧张。

——社会问题是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被多数人认为不合需要或不能容忍的事件或情况。这些事件或情况影响到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不满和焦虑，它是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多方面的力量才可能解决的问题。



——社会问题是一种被许多社会成员所共识的公共问题。这种问题不仅妨碍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而且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样的问题，是由社会本身的缺陷或功能障碍、社会关系失调和整合错位等原因造成的。

通过上述诸多关于社会问题的概括和描述，我们不难看出界定社会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论思想：看一种社会事件、现象、情况是不是社会问题，就是看它是否妨碍了社会的正常运行；看它是否损害或者破坏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看它是否符合某一社会的主导价值规范；看它是否引起了许多社会成员的困惑与迷茫、愤怒和焦虑。

当然，对社会问题下定义，不可能不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包括社会制度、价值观念、规范体系和文化习俗在内的特定文化背景，研究者本人的理论素养、兴趣、研究视角以及人们社会观念的发展变化，等等。但是，无论如何，社会问题的界定还是存在着相对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也可以叫做社会问题界定的一般原则，它包括客观性原则和主观性原则两个方面。

客观性原则是指社会问题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也就是说，社会问题本身具有客观性，它是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的某种具体的消极性的社会事实，而不是人们头脑中的主观想象及其观念。虽然社会学家迪尔海姆认为，社会事实不同于存在于自然界的自然事实，具有属人的主观建构性，但是，无论怎样建构，作为客观事实，它一定是一个事件、一种现象、一种行为，它必然存在着外在的表现形式，人们通过感觉器官能够直接感觉得到。例如，我国的贫困问题是基于还有 3000 万人生活在年均收入不足 540 元的贫困线以下这一事实。

主观性原则是指人们对某一社会事实的感觉、认知和判断，它表现为某种公共麻烦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和头脑中形成的观念。其中主要有：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违背了社会通行的主导价值原则和社